
从国民性视角看日本的右倾化现象

张建立

内容提要: 解析日本的右倾化现象,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对一种思想表现的界定无论是“右”还是“左”,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是一种价值观的甄别,是一种行为模式的选择。日本的右倾化现象,既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亦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更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关键词: 国民性 右倾化现象 自我认知 身份认同 人际关系

作者简介: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7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 (2014) 05-0036-19

近年来,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治右倾化趋势渐强,右倾化现象已经扩散到包括舆论传媒在内的社会各界。日益凸显的日本右倾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关于日本右倾化现象的成因,很多学者从政治、经济等层面给出了见仁见智的解析。本文拟在诸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日本国民性的视角,以期能够对日本的右倾化现象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一 从国民性视角看右倾化现象的必要性

日本社会走向如何,不仅仅是日本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右倾化问题日益显现,中日学界对此都非常关注。下面首先梳理日本右倾化现象研究的现状,然后简要说明一下从国民性视角看右倾化现象的必要性。

（一）右倾化现象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喜欢使用“左”、“右”、“极左”、“极右”和“中道”来分类评述日本的政治思想。所以，谈起日本的右倾化，人们往往习惯于理解为是在谈论政治右倾化。但是，由于近年来日本右派政治家肆无忌惮，其话语开始渗透到主流媒体，右倾文学充斥文坛，加之很多民调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与右派政治家的认同意识也在日趋增强，所以，有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日本社会也右倾化了。如有学者指出，日本的“社会右倾化与政府右倾化相互促进。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如果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不设法制止，前景比较危险”^①。甚至还有日本主流媒体的民调数据显示，日本人自身也认为社会右倾化了。^②日本政治学者、前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五十岚仁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日本不仅政治右倾化了，“社会全体也都右倾化了”^③。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判断日本政治社会已全面右倾证据并不充分，“我们要冷静和严格区分日本部分政治家的右倾化（甚至右翼）和日本民众的普遍右倾化，两者会互为影响，但不能把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④。甚至，日本有些人如自诩为亲美保守派学者的杏林大学名誉教授田久保忠卫认为，这并不是“右倾化”，而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⑤

① 周永生 《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问题探讨》，《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3期。

② 2013年8月2~4日，日本广播协会（NHK）进行了关于日本人和平观的舆论调查。针对第九个问题“最近，关于安全保障和外交，有观点认为日本人的意识逐渐变得右倾了。你个人的感觉如何？”，有25.9%的人认为“变得右倾了，令人担心”，有38%的人认为“虽然变得右倾了，但没有问题”，有23.6%的人回答“不认为变得右倾了”。若将前两项数据加起来的话，有63.9%的受访者认为“日本人变得右倾了”。

③ 五十岚仁「日本は右傾化したのか」、<http://blogos.com/article/80142/>。

④ 张云 《目前判断日本已全面右倾证据并不充分》，2013年5月30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05/3984147.html。

⑤ 田久保忠衛「『右傾』化でなく『普通の国』化だ」、『産経新聞』2013年5月24日。

虽然学界对何为右倾化的概念界定还不够完善^①，但对一些所谓右倾化的表现还是大体形成了共识，即凡是美化日本侵略历史、主张修宪、主张摆脱战后体制、谋求自卫队军力国际化的言行等，均被视为右倾化的典型表现。而且，已经有很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层面就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诸般所谓的原因透析，虽不乏精辟的见解，但依然存在如下三个不足之处：（1）论述往往是浅尝辄止。例如，有文章谈到了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未能深入分析其原因。（2）有些观点彼此矛盾。例如，有媒体和学者认为，右倾化是因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的。日本经济低迷，引起日本人焦躁、民族主义高涨、右倾势力猖獗，进而使日本的右倾化问题日益严重。另有学者则认为，右倾化是因为日本经济繁荣导致的。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及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刺激了政治欲望的膨胀，从物质的层面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打足了底气。^② 其实，虽然不能完全否定日本的右倾化与经济盛衰的联系，但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经济盛衰与其右倾化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③（3）缺乏历史的视野。众所周知，在 21 世纪以前，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和修宪问题上发表右倾性言论要冒辞职的政治风险。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上至总理大臣、内阁要员，下至地方自

^① 在中国学界，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进行明确定义的，主要是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也有其他学者在文章里尝试进行定义，但大多是参阅借鉴了前两位的成果。刘江永称“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恢复靖国神社传统地位，美化日本侵略历史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股政治思想。”吕耀东称“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就是执政的保守政党及其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体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现象。”这两个定义对于我们理解所谓的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帮助很大，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前者主要是侧重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政治倾向，尚未明确将近些年学界讨论的修宪和自卫队军力国际化等问题作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典型表现来阐述和分析。而且，“日本右翼”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日本，政界、经济界、学术界乃至民间都存在着右翼势力，因为同属右翼，媒体往往将之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它们的性质相差甚远。日本右翼的一个共性特征是“排外”，大多数的右翼表现为反俄、反华，也有的右翼表现为只反俄、反华却亲美，还有的右翼则是既反俄、反华亦反美。前者其所理解的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反华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尚不足以全面涵盖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现象。后者的定义内涵外延有很大的扩展，但也因此容易产生歧义。因为，一般而言，我们所理解的日本政治右倾化都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政治思想，而恰如吕耀东在其论文中也明确指出的那样，执政的保守执政党及其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却是积极面与消极面并存的，“民族主义”也不尽是负面的内容。所以，真正实际按照后者的定义来对日本的政治思想进行严密区隔时，也会无所适从。详细论述参见刘江永《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亚非纵横》2007 年第 2 期；吕耀东《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日本学刊》2014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姜良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经济背景》，《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张季风《日本经济低迷与全面右倾化没有必然联系》，《学习时报》2013 年 2 月 4 日。

治体当权者如石原慎太郎、河村隆之、桥下彻等右派政治家，虽然有过类似的甚至是更为颠倒是非的言论，但在日本国内既没有引起政治信任危机，也很少受到道德谴责，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反倒是出现了一种越是发表右倾言论就越受民众欢迎的反常现象。特别是在对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可谓充分地显示出了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的加速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因时而异的反差现象？目前的日本右倾化问题研究，尚未能给出较有说服力的解答。

（二）导入日本国民性研究视角的必要性

鉴于目前国内的日本右倾化问题研究对其成因的解释力尚有待加强，所以笔者尝试着引入国民性的研究视角，从日本人自我认知特点等方面来对日本的右倾化现象之成因做一粗浅的分析，以弥补先行研究的一些不足。

所谓国民性，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的多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即在家庭等各类集团中，按照一定的社会习俗及社会强制性规范，于有意无意中培养出来的行为方式的倾向性选择。这种特性，体现在人们的自我认知模式、交换模式、情感模式、思维方式等方面。从国民性视角来解读一国的社会思想现象，在国际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这方面的经典名著，最早当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1904～1980）亦对其予以高度评价，称“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国民性的描述，虽然时隔一个多世纪，但并没有过时”^①。摩根索也非常重视从国民性视角对一国的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的分析。他把“国民性”归类为决定国家强权的纯粹的人的质量因素之一，并称其特别难以合理地预测，而且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具有持久的、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个“国际舞台的观察者，要想估计不同国家的相对实力，就必须考虑到国民性，不管要正确估价这个如此难以捉摸和无形的因素是多么困难。不这么做，就会导致判断上和政策上的错误”^②。

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日语所谓的“右倾”或“右翼”与中文的“右倾”并非相同的政治概念。所谓的“右倾化”本来也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右倾化的界定都是不尽相同的。即使是相同的界定，但仅是做出或“左”或“右”的分类对问题的解决并不具有多大实际意义，既不能究明右倾化产生的原因，亦难以前瞻其未来走势，更难

^①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② 同上书，第181～182页。

以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恰如法国国家政治学院教授吉尔·德拉诺瓦所言，在日常交谈中，简单地把一个人定义成“左派”或“右派”尚可接受，但在思考问题的层面上还这样做却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称谓都是相对而言并不稳定，按照不同的地点和时期所下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也有持右派观点却持左派作风的人，反之亦然。不能将标示和内涵混为一谈，认为标示说明全部的内涵，这将混淆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的区别而将生活简单化，使其变得没有意义，并因为大量灌输意识形态的自满而付出实际效率低下的代价。适用于“左派”或“右派”的称号，也同样适用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由派”、“进步力量”和“狂热分子”。^①

其实，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一种思想无论是“右”还是“左”，其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是一种价值观的甄别，是一种行为模式的选择。本文导入国民性研究的视角，希望可以超越既往的或“左”或“右”的分类范式，来对所谓的日本右倾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二 右倾化现象是日本人自我再生机制使然

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包含两层内容，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他力再生。它突出表现在日语的“けじめ”与“みそぎ”这一对概念中。“けじめ”本意是“区隔”、“划界”的意思。从“けじめ”一词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它一般都要求做出“けじめ”的人必须根据某种约定俗成的道义对其既往的行为主动做出不同程度的自责和自罚。有日本社会学家称，能够拥有“けじめ”意识，“是日本人的才智聪明之处，是作为成年人的条件”。^②因此，大多时候“けじめ”可以意译为“自我了断”、“罪己”，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

^① 参见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5~146页。

^② 穴田義孝『日本人の社会心理 けじめ・分別の論理』、人間の科学社、1998年、7頁。

使用“罪己”。“みそぎ”可按照中文的习惯表述翻译成“祓禊”。^①

自省“罪己”与“祓禊”的观念，早已成为日本人谋求身心新生的两个重要精神理念。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日本人的“罪己”方式也多有不同。^②个人采取哪种“罪己”方式，主要受外部情境压力大小的影响。例如，2014年8月5日自杀身亡的日本理化研究所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笹井芳树的“罪己”行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笹井芳树因其与弟子小保方晴子合作撰写的关于万能细胞 STAP 论文造假嫌疑而招致各方严厉批判。所以，笹井芳树首先采用的是第一种“罪己”方式，即在2014年4月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公开道歉。但是，社会问责之声依旧不断，甚至出现了各种侮辱性的报道，于是他又想通过辞去公职谢罪，但未果。形形色色的社会舆论令其身心疲惫、精神状态恍惚而不得不去看医生，最终还是因未能忍受住外部压力而选择了自杀谢罪的方式。

虽然自我了断生命，特别是像笹井芳树这样在世界再生科学研究领域都屈指可数的科学家自杀“罪己”令人痛惜和同情，但是，通过对诸多日本人“罪己”的事例予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罪己”，虽然表面看来是种基于伦理道德标准而主动进行的自罚，但实际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以退为进、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罪己”者对自己的行为将会受到何种责罚会进行心里估算，很多人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并非完全出于真诚的忏悔之心，而是企图通过自己先承认错误，请求宽恕，来减轻乃

① “みそぎ”是“みそぎはらえ”的略语，日语汉字为“祓禊”，汉语中的习惯说法是“祓禊”。它是日本神道中很重要的术语。在日语中有时也会将“禊祓”分开来用，但含义基本相同。据《广辞苑》的解释，“禊”有两种含义“①身上有罪或污秽时，或者参加重大的神事之前，在河、海洗浴净身。②禊祓的略称”。“祓”有三种含义“①指为了拔除灾厄、污秽、罪障等而进行的神事，或者进行这种神事时对神宣读的祈祷词，或者是除厄牌。②为了赎罪而献出的物品。③币帛。”“祓禊”又与“大祓”同义，“古时候，6月与12月的晦日，亲王以下在京的百官会集在朱雀门前的广场，举行拔除万民罪孽和污秽的神事。现在以宫中为首在全国各神社依然在进行这种神事”。日语的“禊祓”，无论是文字，还是其含义，均可溯源至最迟在西周时就已形成的中国祓禊之古俗。在日本文化中，“祓禊”观念，不仅已经成为日本神道祭祀的重要内容，而且也已成为各色日本人等净身洁心的重要仪式。由于受“祓禊”观念的影响，日本人不仅注重生活环境的清洁，也格外注重追求人格的清白。当自身有了错误的言行时，往往就会觉得自己的身心都被玷污了，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或类似仪式性的行为来祛除污秽以获得新生。

② 作为个人的“罪己”方式主要有如下四种：（1）通过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等从社会声誉上对自己进行责罚，这也是最为普通的一种“罪己”方式；（2）对自己处以经济上的责罚，如主动要求减少或扣除工资、奖金待遇等；（3）通过主动辞去公职等从社会地位层面进行自我惩戒；（4）对自己处以身体上的责罚，轻者，如把一头秀发剃光，或者是徒步到宗教圣地参拜修行等，重者，则会用自杀的方式谢罪，这也是最为严厉的“罪己”方式。

至回避他罚。因此，自罚“罪己”的最终目的是先行防御以取代、回避他罚。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历史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1945年8月25日时任首相的皇族东久迩在会见记者时提出的模糊战争责任的口号——“一亿人总忏悔”。关于其对日本社会的深远影响，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有过很精彩的评述“忏悔是先于他人追究责任之前，陈述自己的责任，坦白并忏悔自己的罪过。自责是通过坦白、忏悔，承认自己的责任，以图免去他罚。它的重点不在于查明责任，给予与罪过相应的处理。这种抢先自责和自嘲同样是为减轻、逃避他人的追究，作为自我防卫手段而使用的。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因此扭曲了至今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以至今天在日本连一个违反政治道德的政治家的责任，也不能彻底追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①

“罪己”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的行为，它并不能保证对事情进行客观的自我反省和责罚。相对而言，“袪褻”则是来自于外部的责罚和磨砺。只有在经历“袪褻”后，即接受外部的责罚真正获得了社会的谅解之后才会被允许复出。例如，一个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辞去议员或者是某一官职做出了相应的“罪己”后，待经过一段时间再次被任命为官时，便会称“袪褻结束了”，意即已经接受社会责罚并获得许可复出了。而且，再度任职甚至会比其当年辞去的职位还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尚有前嫌未释，人们一般也不会再去翻其旧账而横加指责。比如，2004年5月7日，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因三年零一个月没有按时缴纳国民养老金问题，不得不引咎辞职以示“罪己”，但却在三年之后的2007年9月25日召开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第91任首相。虽然日本国民养老金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福田康夫荣任首相之后无论其政敌还是媒体都不会再纠缠此事。再比如日本2002年8月9日，时任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纪子因涉嫌非法领取秘书工资一事在一片追讨声中被迫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位，但在2003年的众议院大选中参加竞选并顺利当选后，别人便不会再拿其以前的事情来指责她。

如果结合日本人的自省“罪己”心理与“袪褻”心理来解析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日本民众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与右派政治家的认同意识日趋增强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多数日本人在战后初期能够承认日本

^① 南博《日本的自我——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刘延州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军在侵略战争中曾有过残酷行为，其负疚感也是很强的。但是，随着战争责任在“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下化整为零而不了了之，一些侥幸逃过绞刑的战犯如重光葵、贺屋兴宣等再度成为了日本战后政界和商界的要人。例如，1957年组阁的岸信介本人就是甲级战犯，其内阁中，从大臣到长官，曾接受过“清洗”的人达半数。^①再加上亚洲各受害国因受美国阻挠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很好地追讨日本对战争的赔偿，及至今日，当年战犯的儿孙们都已经再度坐上首相的宝座了，所以按照日本人的“袪褻”心理，很多日本人包括精英政治家们自然会认为“一亿人总忏悔”的反省“罪己”已经得到了世间的原谅。既然“袪褻”关已过，那么历史的包袱自然也就可以卸下了。然而，当得知自以为是的“罪己”并没有得到亚洲受害国人民的谅解时，特别是一些右派政治家们便表现得有些恼羞成怒，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口无遮拦，肆无忌惮。无论是令人诟病的日本右派政治家出尔反尔的言行，还是承认战争的侵略性亦知道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却依然狂热地支持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支持右翼代表人物田母神竞选东京都知事的日本20多岁年轻人的言行，都与日本人这种自我再生机制的心理影响有很密切的关系。

三 右倾化现象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

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在发表的一篇短评文章中称“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早在20年前就已开始了。换言之，安倍的右翼性政策只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来使日本政治发生转变的右倾化倾向的一部分而已（尽管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不管安倍执政期间是否会继续使日本右倾化，这种右倾化倾向既不是因他开始，也不会因他退出政治舞台而结束”^②。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右倾化现象实质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所谓的右倾化的路线选择，正是日本精英们意欲统率日本民众谋求建构新环境下自我认同的手段。

日本虽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但一直处于近似美国的一个州的政治地位^③，加之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导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

① 参见游博《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和平与发展》2006年第4期。

② 内田樹「中野晃一先生の安倍政権論」、http://blog.tatsuru.com/2014/03/04_1902.php。

③ 日米問題研究会『日本がもしアメリカ51番目の州になったら 属国以下から抜け出すための新日米論』、現代書林、2005年。

的丧失，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日本对外越来越难以保持过去的从容与优雅，愈来愈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其对外政策更具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更显急促甚至焦躁。恰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①日本在国力兴盛时虽然也起到过“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的作用，但是，它终究不过是一个介于世界战略力量板块之间的边际国家，式微时则难免会跌入太平洋两岸间的“战略洼地”，其三种基本的社会需求——安全、社交、地位，不仅在过去一直难以完全得到满足，而且现在越来越面临无法得到确保的危机，因而激发了以准西方国家身份自居的作为东亚游离者的日本开始主动寻求融入东亚的战略调整。鸠山由纪夫倡导的“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意识。但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无果而终，再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在东亚地区，无论终将由谁来发挥实质性的主导作用，也不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朝贡体系下的那种国际关系。虽然日本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一直想主导东亚，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未能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日本由于在心理及定位上缺乏亚洲归属感，在政治安全领域又受制于美国，所以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上既无法“脱欧”亦不情愿“入亚”，加之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能坦诚心谢罪的言行也使得其难以“入亚”，难以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谅解和接纳。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说“日本这一国家，在由美国担负主要作用的地域性以及全球性安全保障的框架之中，决不能成为决定整个锁链强度的一项薄弱环节。由于日本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民主主义国家之一，对于世界的健康福利及安全保障，必须作为一个创造净利的贡献者而存在。日本将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日本将成为一个对于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做出更胜以往的积极贡献之国。诸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我所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积极和平主义之国。如今我已有所懂得。我所肩负的历史使

^①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命，首先是要再次赋予日本活力，鼓励日本人民变得更加乐观积极，并以此促使他们成为宣扬积极和平主义旗帜的光荣旗手。”^①言易行难，安倍的志向不可谓不够远大，但恐怕也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国际形势变化越剧烈，人们就越需要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文化认同问题就越突出。对日本而言，欲解决身份认同危机，必然要探讨如何对待天皇的问题，因而也必然要涉及修宪的问题。目前，大家关注日本的修宪，主要是从安保的角度关注其修改宪法第九条图谋日本军力国际化的问题。“正常国家化”是日本各党派一直以来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是各党派欲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不同，即是傍美还是亲华。日本不会放弃“正常国家化”这一目标，而中国更应该未雨绸缪关注其实现目标之后的身份认同建构取向以及中国的应对问题。

日本人缔结集团的特点使其非常看重序列和地位差，要么是顺从附庸一个可以给予其安全感的老大，要么回归亚洲做老大，可是且不说回归亚洲做老大在今天无望，在过去也未得逞，就是自然回归亚洲也面临着历史认识问题的障碍，所以，突破历史认识问题的障碍成了日本政客们难以摆脱的困境。美国的式微，中国的日益崛起，国际形势的动荡，日益加剧了日本人的认同危机。十年来，日本政坛一年换一相，经济不振，人人盼望强大安全的日本，其表现就是对强势安倍的支持。安倍内阁的连续高支持率，可谓这种民心求安的反映。

一般而言，所谓“国家认同”，是一种将国家视为“己者”而非“他者”的感受，是指一国公民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爱国往往是国家认同的升华，而国家认同则是爱国的前提。“爱国主义”常常被理解成是一个公民对于其所认同的自己国家的热爱和忠诚。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反倒是在学术理念和现实政治中大相异趣：前者显示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后者却意味着对民族的忠诚。在多民族国家里，通常主体民族比非主体民族更容易产生由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甚至两者“合二为一”的感情，当非主体民族主观上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缺乏应有的尊重，或者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和地位时，就会产生“他者”的感觉，因而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会越来越低。比较而言，日本是一个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其追求同质性的国民性也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容易与爱国主义合二为一，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也较容易获得本国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

^① 《安倍内阁总理大臣 2013 年赫尔曼·卡恩奖获奖感言》，2013 年 9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309/25hudsonspeech.html。

因而某种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就容易快速渗透到民众中去。而统合日本国民思想建构身份认同的最便利有效的工具就是天皇，这也是所有右翼都尊皇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当这个工具用起来不顺手时，右翼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也会对天皇发出不敬之言。^①

虽然右翼尊皇，但不能因此将天皇乃至天皇制仅视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文化根源不加分别地进行批判而无视天皇本人的言行。其实，无论是没有被追责的昭和天皇还是现今的平成天皇，他们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修宪问题的态度，与日本右派政治家乃至右倾化的民意恰恰是截然相反的。昭和天皇当年正是因为靖国神社里开始供奉甲级战犯才停止去慰灵，其后至今，天皇一直没有去参拜过靖国神社。右派政治家利用天皇的意图却十分明显。例如，2013 年 4 月 28 日，日本政府举行“主权恢复日”活动，就在天皇夫妇即将退场时，首相安倍晋三等人在天皇面前突然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从电视画面上平成天皇惊诧的神情和不知所措的样子来看，此举显然并非天皇本人所愿。

从日本媒体的民调数据来看，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赞成修宪，而意见分歧主要在是否要修改宪法第 96 条和第 9 条上。^② 安倍称，日本今天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其首先要做的是修宪。以安倍为首的右派政治家一直认为，《日本国宪法》是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缺乏自主性，一定要制定一部日本人自主的宪法。但是，平成天皇并未迎合民意，也未附和右派政治家的修宪言论。恰恰相反，他公开宣称，正是在知日派美国人的协助下制定的日本宪法维护了至今的日本和平。2013 年 12 月 23 日，平成天皇迎来了 80 岁寿辰。在生日前的 12 月 18 日，他在皇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称平生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以前的战争”，并表示“想到那么多对未来有着各种梦想的人们，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生命，感到万分痛心”。针对战后重建的步伐，天皇回忆称“战后，在国际联盟军队占领下的日本，把和平与民主主义作为应当遵守的重要理念，制定了日本国宪法，经历了各种改革才有了今天的日本。对于当时的我国国民为建设因战争荒废的国土所付出的努力，我一直抱着深深的谢意。另外，我认为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时的知日派美国人的协助。”他还强调，今后依旧要站在遵守宪法的立场上行事。^③

① 「石原慎太郎、衝撃発言『皇居にお辞儀するのはバカ』『皇室は日本の役に立たない』、http://biz-journal.jp/2014/03/post_4279.html。

② 『東京新聞』2013 年 5 月 18 日。

③ 「天皇陛下の記者会見」、<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kaiken/kaiken-h25e.html>。

很多先行研究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右倾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主要责任之一在于保留了天皇。事实上，美国的责任主要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美国为一己之私允许日本战犯重新掌握政权，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政府开辟了一条不承认侵略战争、坚持右倾史观的道路。^①至今，美国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行为本身的性质亦不是很在意，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能给中国造成威胁，符合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甚至可以说美国是支持的。对于小泉执政时的连续参拜，美国政府也未置一词。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虽然美国政府接连表示“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改变安倍的政策，不过是美国向亚洲各国显示的一种姿态而已。安倍坚持日美同盟、围堵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方针之一，也是美国所向往的，只是安倍走得快点罢了。美国的表态，也不过是担心日本右派政治家的言行激怒中韩，进而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而做的样子。

四 右倾化现象是日本的人际关系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右翼排外，因此对右翼来说，美国理应占据日本排斥国之首，但自战以来，“美主日从”的关系并没有改变过。虽然有要对美国说“不”的右翼政客，但实质上这些人还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些右翼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所谓“国际关系”，是指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式，其归根到底是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日美战后以来维持至今的“美主日从”的关系，与日本人的“親子”关系十分相似。所谓“親子”关系，是指明显带有地位差和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在日美关系中，美国是“亲”，相当于父亲、老大、保护者；日本相当于儿子、小兄弟、被保护者。人际关系模式是在无意识层面起作用的，因此，日本人往往会表现出不仅令美国人也令日本人自己都费解的顺从。日美关系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安倍上台后，他本人及其阁僚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断激起中、朝、韩等国的愤慨和批判，令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忧心不已。但

^① 参见陈景彦《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自 2014 年 3 月以来,安倍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很大转变。2014 年 3 月 3 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一反常态地表示,将继续历届内阁的立场,不仅要继承关于承认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村山谈话”,还明确否认将修改“河野谈话”。同日,参加了要求修改“河野谈话”集会的日本文科省副大臣樱田义孝还受到了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的“提醒”。3 月 14 日,日本外务省向美韩两国传达信息称,安倍晋三将在国会答辩上做相关表态。当天下午,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再度表态,“安倍内阁并不打算修改‘河野谈话’,对待历史必须谦虚”,而且还不忘打出情感牌,称“想起她们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苦,我感到非常痛心”。3 月 23 日,安倍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称,如果安倍政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事实,应该发表新的谈话。此语一出,立即遭到韩国和中国的批判,也遭到了菅义伟的否定“安倍首相已经明确讲了不会修改‘河野谈话’。那是萩生田个人的意见。”安倍此举显然是为了顺从美国的忠告以实现日美韩首脑会谈,谋求打破其在东亚的外交僵局。对待历史问题看起来极其顽固不化的安倍政府,顺从美国政府的忠告做出如此大的转变,其实也是深受这种处理人际关系模式的影响。

另外,日本式人际关系还习惯于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对二者进行切换。日语中的“建前”与“本音”这一对概念较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式人际关系的这一特点。所谓“建前”,指的是“表面一套做法”,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如何”;“本音”是指“表面做法背后的实质”,表达的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话、想干的事情”。在与人际交往中,能够做到准确地区分出“建前”和“本音”很重要。这在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家的“失言”现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人的失言(口误)理解成为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流露,而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日本高官的失言则是反映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由于其“本音”与“建前”的切换出了问题而表达错了场合。粕井胜人为其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发言道歉时就称,作为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那样讲是不应该的,但他并没有认为其所讲的内容本身有什么不对之处。

结合日本式人际关系特点来分析安倍首相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可知,其“本音”就是要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又不得不在外表上加以掩饰。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诸如此类的行为,虽然在政治文化中并不罕见,但大多是作为一种负面的行为而遭到伦理规范的约束。因此,在一般人看来,也许会把

类似于安倍这种过度的表里不一的行为视为人格分裂或人格缺损，但很多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安倍是在掩饰“本音”方面较为老练的政治家。

在“亲子”关系模式下，“子”方在“亲”面前如何熟练切换“建前”和“本音”需要一番工夫。有时候“子”对“亲”也有不满，想发泄一下“本音”，但对发泄“本音”的“度”的把握很重要，若是太过分了则会招致“亲”生气，“子”会被敲打，会失去“亲”的保护。因此，“子”的发泄实质上不过是类似一种撒娇的行为。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是充分利用，同时保证不失控。安倍坚持美日同盟、配合美国多边制衡中国，也是美国所期待和支持的。但是，安倍内阁日益显露的沿右倾化路线狂奔之势，已激怒中韩并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因此，安倍的“本音”受到美国严厉斥责实属必然。

例如，2007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议案。^① 2013年4月27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强调日本的侵略历史“不容置疑”，称安倍试图修正历史是“自我毁灭”。《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安倍否认侵略是“可耻”的。^② 2013年5月，美国国会调查局发布报告，指出“安倍是顽固的国粹主义者，支持否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亚洲所受损失的历史修正主义”，其历史认识“导致东亚国际关系陷入混乱，令人担心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能受损”。报告强调，美国和日本的邻国都在高度关注安倍关于慰安妇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行。在美国，担心安倍的历史认识引起东亚不稳的声音不断高涨。^③ 另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莫顿·霍尔珀林在与日本国会议员座谈时明确表示，安倍所谓美国要求日本解释修改集体自卫权的说法是胡说八道，特别强调美国很多人认为安倍在考虑集体自卫权之前应该先解决历史认识等问题，这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前提。^④ 2014年7月1日，日本宣布内阁同意修改集体自卫权解释，这并非安倍政权一天的功劳，而是在十多年前已经定下的基调。美国虽然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了支持，但仍没有忘记对日本的对俄外交及对朝外交的高调管控。从安倍内阁受到美国敲打后便不

^① 参见《详讯：美国众议院通过有关“慰安妇”问题议案》，2007年7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7/31/content_6453345.htm。

^② 参见《美报批安倍否定侵略“可耻”》，2013年4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29/c_124647152.htm。

^③ 参见《美国对安倍首相的历史认识表示担心》，《参考消息》2013年5月10日。

^④ 「米NSC大物が『安倍首相のウソ』明言解釈改憲はデタラメ」、2014年5月15日、<http://www.nikkan-gendai.com/articles/view/news/150186/1>。

敢轻举妄动的反应来看，美国对日本的管控力依然有效。

五 日本右倾化现象的未来走势

对于日本右倾化现象的未来走势，我们可以借鉴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方法，结合日本国民性的特点来进行如下分析。

第一，从国际体系层面来看，虽然日本的右倾化动向令人担忧，但鉴于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特点，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将促使右倾化不得不有所收敛。不仅是曾深受日本右翼之害的中国与韩国不会容忍右倾化的加剧，而且首先日本万般依赖的同盟国美国也不会任由其发展。无论是以退为进的“罪己”，还是既往不咎的“袪襖”，日本皆是以美国对其认可程度为标准的。情境中心主义的日本人，格外看重来自外部的评价，特别是来自欧美国家的评价。战后以来的日美关系既符合日本“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亲子关系的特点，也是美国“极致个人”基本人际状态下寻求社会心理平衡的结果，彼此间是一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帮助者与被帮助者的关系，因而导致“亲子”模式下“美主日从”的特殊关系能够延续至今。心理文化学理论认为，虽然不同基本人际状态下的“心理社会均衡”结构模式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为了维持其心理社会的动态均衡，其中部分构成要素的变更则相对会容易一些。日本与美国，都是彼此社会心理均衡模式的一个构成要素，若彼此能够继续保持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则“亲子”模式下的“美主日从”关系仍将会一如既往，反之，只要有一方功能弱化，这种关系就将难以为继。^① 美国对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对日本合理地利用但不失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某种意义上为了共同利益，与日本的保守右翼势力保持了共存的关系。但是，在关键时刻，如前所述，美国就会出来压制日本的政治右倾动向。也就是说，日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并不存在共同价值观，美国也始终在警惕着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过度抬头。

归根到底，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接受美国的亚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日本的右倾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推翻东京审判和《波茨坦公告》，实现安倍宣称的“摆脱战后体制”。如果其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将意味着日美同盟的终结，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这种新关系将充分体现日本的意

^① 参见张建立《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

愿，是真正的“超越战后”的产物，但这绝非美国所愿。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亚洲地区的利益，美国也不可能任由其发展。

第二，从日本国内层面来看，多数日本国民追求满足其社会需求的方式与安倍等右派政治家的路线设计并不相同。心理文化学认为，“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是每个文化的人都必不可少的社会需求。每一种社会需求依次又分为生物性、社会性、情感性需求这样三个层面。日本历史学者与那霸润称，全球化的发展使日本人的社会需求面临着危机。日本人习惯于把19世纪以后本国的历史理解为“西洋化”，并常常伴随着在亚洲只有日本“西洋化”成功了这样的自豪和自尊心。但今天的日本人正在失去这种自信，在近近年来全球化浪潮下这种自尊心受到了双重意义上的伤害。首先，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等方面的成功，使得所谓只有日本“西洋化”成功了说法难以为继。结果能够满足日本人“没有输给周边国家”的自尊心，就只有自吹日本人的“民族性”优于其他民族，日本的“历史”与近邻诸国不同，没有丝毫污点之类的露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主义了。这种结构便成为绑架东亚全体的经常出现的“历史问题”的背景。其次，日本人对将来的展望缺乏信心。日本要想把在亚洲只有其“西洋化”了作为比其他国家优越的证明，就需要“所有的国家不论迟早都得西洋化”这个大前提。因为只有同一个“西洋化”的跑道上赛跑，“第一个跑到终点”的日本才有作为胜利者的资格。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没有“西洋化”却实现了经济发展并跻身世界强国行列里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反证。这到底是为什么？日本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焦躁不安。^①

2013年2月23日，安倍晋三在华盛顿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安倍借此向世界宣誓：日本永远不做“二级国家”，“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②然而，其实现所谓强大日本的路径选择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愿。日本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结果大都显示日本人期待的是“安倍经济学”为日本人画的经济蓝图，而非解禁集体自卫权将日本人再度送上战场。日本人希望“安倍经济学”能够让他们重新找

^① 参见2013年6月7日爱知县立大学日本文化学部历史文化学科副教授与那霸润在北京师范大学出席其著作《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中译本出版纪念典礼时做的讲演。與那霸潤「『中国化する日本』の教訓 新しい日中関係のために」、<http://bylines.news.yahoo.co.jp/yonahajun/20130626-00025576/>。

^② 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回昔日的自信，或者如某些有识之士所言至少希望“安倍经济学”的成功能够使日本维持现状。^① 日本人口从 2005 年就开始减少，2030 年将减少到 1.15 亿，2050 年将减少到 9500 万。其中，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30 年为 31.8%，2050 年将达到 39.6%，14 岁以下的人口比率 2030 年仅为 9.7%。在少子老龄化与有增无减的巨额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高达 200% 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进行任何大规模军事建设，因此，可以说日本未来可选择的出路是有限的。^② 从日本内阁府 2011 年至 2013 年进行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接近 70% 的国民最期待政府做的事情是振兴经济、增强社会保障^③，而不是加速日本的右倾化、对中韩示强。

安倍内阁肆意炒作 2014 年 5 月 24 日中日军机在东海近距离接触事件，本以为会增加“中国威胁论”的借口以利于其推动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即可实现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未想却弄巧成拙，让日本国民愈发感受到战争火药味渐浓，加大了对安倍企图的抵制。根据 5 月 24 日、25 日《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民调结果显示，有半数以上的日本国民对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持反对态度，而且朝日电视台（ANN）的民调数据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降至其组阁以来最低点 45.7%。2014 年 7 月 1 日安倍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事关日本国家是否走上战争之路的重大问题，安倍没有通过修改宪法，也没有在国会中进行审核，仅仅凭个人的意志就擅自作出了决定。这引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就连一直比较支持安倍的《产经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以及包括 NHK 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民调数据都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一下跌至 45% 左右，达到了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的最低点。2014 年 7 月 13 日，日本滋贺县知事选举投票，无党派新人、前民主党众院议员三日月大造首次当选。本次选举期间，日本政府通过的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广遭诟病，亦成为自民党支持的候选人落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民党原本希望在 2015 年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

① 参见 2014 年 6 月 10 日日本亚洲论坛理事长吉原钦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座谈时的发言。

② 橘玲「今年のことはわからなくても、10 年後の日本はわかっている」、『週刊プレイボーイ』2014 年 1 月 6 日号。

③ 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世論調査報告書』（2011）、<http://www8.cao.go.jp/survey/h23/h23-life/2-4.html>。『「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世論調査報告書』（2012）、<http://www8.cao.go.jp/survey/h24/h24-life/2-4.html>。『「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世論調査報告書』（2013）、<http://www8.cao.go.jp/survey/h25/h25-life/2-4.html>。

之前，通过此次选举助推该党同样视为重点的10月份福岛县知事选举和11月冲绳县知事选举，但开头就以败选告终。这对安倍执意推行右倾政策无疑是一个警示。一些支持安倍的媒体也都发出声音规劝安倍要把心思收回到如何振兴日本经济上来，“应该再次向国民显示出最重视经济的姿态，同时，要将‘安倍经济学’的效果渗透到地方和社会之末端。唯此才是实现长期政权的关键”^①。

第三，从安倍个人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层面来看，也有人担心由于6、7月份以来内阁支持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长期执政，无计可施的安倍^②非但不收敛右倾化的言行，反倒可能会变本加厉煽动民族主义右倾思潮。^③也有人认为，安倍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右派政治家，而是一个唯美国是从的机会主义右派政治家。^④2006年安倍首次组阁后曾当众否定小泉的中国政策，除了亲自访问中国，还表示全面修改靖国神社对策，保证不在首相任内再去参拜，由于他的积极表现，特别是不同于小泉政策的表现，获得中国信任，中日关系也迅速恢复正常。如果来自国际体系层面与日本国内政局对安倍执政压力增大，安倍亦能客观考虑其个人及其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的话，他像第一次组阁时那样180度大转变，一改右倾言行而在改善日中关系上做出一些切实的努力，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加拿大国际管理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姆斯·马尼科姆对中日关系持乐观态度，认为日本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前修复中日关系似乎也有据可循。^⑤

总之，所谓“左”或“右”本身就是具有相对性含义的词，所以欲科学且精确地界定“右倾化”的概念实非易事。不囿于或“左”或“右”的分类范式，而是从国民性的研究视角整体性地解析所谓的日本右倾化现象，反倒更有利于深入理解日本社会思想动态、成因及前瞻其未来走势。因为战后以来形成的日美间“美主日从”的关系类似日本人之间的“親子”关系，是日

① 峯匡孝「産経 FNN 世論調査 アベノミクス評価に大きな陰り 内閣支持率下落の背景」、<http://www.sankeibiz.jp/macro/news/140721/mca1407212154006-n1.htm>。

② 安倍本来计划于2014年8月末就解决被绑架日本人的问题访问朝鲜，以提升和保持内阁的高支持率，但因美国的阻止，能否成行成了未知数。

③ 木村正人「株価に連動しなくなった安倍政権の支持率」、<http://bylines.news.yahoo.co.jp/kimuramasato/20140728-00037744/>。

④ 「首相靖国参拜 財界・官僚は『ちょっと失敗、やめとけ』反応」、「週刊ポスト」2013年1月24日号。

⑤ 参见《日本欲在APEC会议前修复中日关系》，《参考消息》2014年2月1日。

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所以当日美关系模式发生变化或者世界出现了可能会影响这种模式的重大因素时，日本在对外交往上就会表现出明显的缺乏安全感，同时还会表现出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加之日本国民性中情境中心主义、缺失恒定的是非观与善恶道德标尺的特点，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近年来日本右倾化现象愈发凸显。所以，寄希望于善于熟练切换“建前”和“本音”的日本不说空话走正道，用更为实际和持之以恒的言行来证明其值得邻国信任，至少在短时期内似乎不大现实。2015 年，即二战后 70 年，一个筹划已久的安倍新谈话将如何对待“河野谈话”、“村山谈话”和“宫泽谈话”，如何为其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提供指针，尤其值得关注。

Japanese Right-d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haracters

Zhang Jianli

It is necessary to both know the truth and the cause of Japanese right d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haracters, the definition of “left” or “right” in terms of the reflection of thoughts can be all finally considered as a self-cognition, a examination of outlook and an option of behavior pattern. Japanese right-deviation can be also considered as a result of the “self-regenerative regime” of Japanese people, a reflection of Japanese searching their cultural self-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self-identity crisis, and a kind of projection of Japa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民性の視点から見た日本の右傾化現象

張 建立

日本の右傾化現象を分析する際、そのさまざまな事象を整理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更にそうさせた原因を明らかにする必要もある。国民性の視点から見れば、ある思想に対して、右か左かどちらに分類しても、結局のところ、一種の自我認知であり、一つの価値観に対する見分けであり、一種の行動モデルへの選択である。日本の右傾化現象は、日本人の再生メカニズムによるものであり、ま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危機による文化におけ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再建ニーズの表れであり、なお日本の人間関係が国際関係における投射でもある。

(责任编辑: 李璇夏)